

10/13

見山文史



第二輯

8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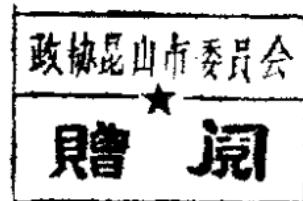


yt91/40

昆山文史

第二辑

(内部资料)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县委员会

文史征集委员会编

一九八三年九月

昆山文史

第二辑

(内部资料)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昆山县委员会
文 史 征 集 委 员 会 编

本辑编辑

祝崇炎 胡静盦 章澄清
金 达 徐伟华



顾亭林先生画像

“近得顾亭林先生五十五岁小像一帧，系魏之鼎所绘，上方有自题一律，又有关朴、尤衍抄述，下方黄宗羲、钱孔培两题，……”

——李平生（且硕七十年秋）

顾瑜自供稿

顾亭林画像自题诗

鬢毛星塵數十年空樓窗
遍嘗口瘡漫期竹潤麻
三笑其年移花付山去
舊情譙真性養鶴家
鶴性一游何若譙如春
共君酒味傳神妙風
像

於萬物應萬象作萬化萬象

凡人皆有本性無以立成
時人目之一呼一吸耳

某人自作

董宗義題順亭林像



李公先生
國朝人也。善書畫，尤工蘭竹。其筆觸蕭疏，得天然之趣。予嘗得其墨竹一枝，每以爲奇物。今不幸而失之，甚爲惋惜。特作此詩以紀念之。

江浦游人半是生
富貴在山林薄暮
易接學道者疏
食不為子弟往
俗而佛也。鄉里遺
都園中醉一
指教誨及每
濟淳化素琴
李公先生善書画
其筆者故得名
美傳者甚多。余
托微旨。并請
鑒定文才

志業唯匡濟言行務實先
日知寧漫錄天下信鴻編
樸學開清代崑山仰大賢
興亡匹夫責愛國典型傳
亭林先生誕生三百七十周年紀念

葉聖陶題

一九三三年八月

叶圣陶题诗

目 录

纪念顾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周年

- 纪念顾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周年 胡静盦 (1)
渺然高风 廖天一鹤
——爱国学者顾炎武传略补述 顾雨时 (16)
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年纪念 恭赋 孙玄常 (25)
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年纪念 恭赋 陈次园 (26)
亭林墓记 顾凤鸣 遗稿 (27)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手稿流传始末 金 达 (29)
归庄事迹札记 陈兆弘 (34)

战斗迎黎明——解放战争时期昆山城区秘密

- 工作片断 王志勤 (43)
忆地下党在昆山县城两所中学的活动
..... 陆炳中 王元鼎 (49)

我的片断回忆——送军米支援十九路军 樊 翔 (55)

- 《贞丰八年血泪录》(节录) 朱润苍 遗稿 (58)

[附录]：一、《贞丰八年血泪录》自序

二、日伪统治下历年米价上涨情况

半个世纪来昆山度曲的动态 张英阐明 (70)

- 振东侨乡创建小记 伍胜松 (81)

- 轰动昆山的民元庄书革弊风潮 本刊 整理 (84)

昆山县中创校记

- 兼忆吴粹伦校长 迅 鸿 (90)
当年弦歌声 明日复青云
一忆卅年代县中校歌、十周年纪念歌歌词 顾庆中 (100)
忆故乡几位教界前辈 周守愚 (102)
学坛忆闻 徐澄宇 (108)
- 昆山银钱业史概貌(下) 吴本廉 (111)
我所知道的昆山米业概况
江旦生口述 江翠英 徐君贤整理 (125)
解放前的同丰油厂 谢志刚 张葆良 (130)
- 周市野味——昆山特产之一 吴泽万 (135)
二十年代里小吃行当中的几个“状元” 胡静盦 (137)

纪念顾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周年

胡 静 童

顾亭林先生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和著名的爱国学者。初名绛、字宁人，明朝覆亡后，改名炎武，后又自号亭林，后人尊称为亭林先生。他家居我县千墩镇的蒋泾，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公元1613年）五月二十八日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正月初九日。今年是亭林先生诞生三百七十周年。

高风亮节 光照史册

先生童年时期，在良好的家庭教育下，勤奋好学，六岁时就读《大学》，七岁入塾，十四岁时已读了四书、五经、通鑑、兵书、性理诸书。进了县学以后，与归庄①一起参加了复社②以文会友，评议时政。同时，研习“帖括”之学③嗣后，他连年应试，可是没有考上举人。明崇祯十二年（1639年）秋闱④之后，他深感举业株守一经，不谙世事，空疏浅薄，决定放弃“岁试”，绝意仕途，发愤读书。“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，一代名公文集及奏章文册之类”。“凡阅志书一千余部”。开始撰写《肇域志》和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。顺治二年（1645年）清统治者率兵南下，用“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”的民族高压政策，实行“满城杀尽，然后封刀”的血腥残暴手段。当时，激起了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的反抗，报以“头可断，发决不可剃”的响亮口号，高举义旗，奋起抗清，我县的正仪、张浦、陆家、安亭等乡镇的农民纷

纷组织村兵。县令杨永言于是年五月二十二日尽放狱中囚犯，与先生及归庄、吴其沆参加苏州的抗清战斗，但由于寡不敌众，不久，清兵便占领了苏州，他们就退回昆山。六月十一日投降清朝的昆山县县丞阎茂才以知县的名义，下剃发令。当时，群情愤慨，立即焚烧了县衙门，杀死了阎茂才，公举曾任狼山总兵的王佐才为主帅，县令杨永言为监纪，先生与朱集璜（朱柏庐父）聚粮移檄，于闰六月十五日闭城拒守，力抗强敌，同清军激战。七月初二日，正仪村兵战败，七月初六日巳刻县城被攻破，清兵就洗劫屠城，被杀的人达四万多^⑥，王佐才、吴其沆、朱集璜英勇就义。先生的本生母何太孺人被游骑砍断右臂，两个弟弟子叟、子武殉难。弟媳朱氏引刀自刺其喉、僵卧瓦砾中得免，先生与杨永言、归庄幸免于难。七月初八日常熟城破，先生嗣母于二十四日听到消息后即绝食，到三十日临终时遗命先生勿仕二姓。

家破人亡，先生悲痛欲绝。于是乔装改扮，一直在大江南北，过着隐姓埋名的亡命生活。顺治七年（1650年），他与归庄参加以叶恒奏、吴炎为主盟的惊隐诗社^⑦。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春，投清劣绅叶方恒图谋先生田产，侦知他从南京潜回昆山，唆使顾氏家奴陆恩以“通海”^⑧罪出首。先生因事关重大，就擒陆恩投入河中淹死。叶就以“无辜杀奴”罪讼之于官。后经友人营救，移狱松江。迨至翌年春，才得释放。五月间，叶方恒又遣暴徒狙击先生于南京太平门外，头部受了重伤。

清顺治十四年（1657年）清皇朝的统治已渐趋稳定，先生感到在江南长期居留是很困难的，他就毅然离开江南。当时，归庄以《送顾宁人北游序》为之送行，潘柽章、万寿祺、吴炎等二十人写了《为顾宁人征天下书籍启》以壮行色，为先

生北游作了介绍。从此，他以友人所赠的二马二骡载着不少书籍，辗转于山东、河北、河南、山西、陕西、浙江等地，历程几万里，读书数万卷。在行程中，他登山涉水，历尽艰苦，每到一地，即借阅古籍、志书，研究史乘、地理，记录赋税徭役，访问民间疾苦，调查农田水利，考察用兵形势，……，以开扩认识的源泉和丰富研究的领域。诚如全祖望所说：“考其山川风俗，疾苦利病，如指诸掌”。在长期流亡不定的生活中，他曾五谒孝陵，三谒天寿山十三陵，四谒庄烈攒宫，吊宋六陵，谒禹陵，眷怀故国之情不泯。他还结识了不少具有抗清思想的志士，如山西的傅青主⑧、戴廷栻⑨；浙江的朱彝尊⑩、黄宗羲⑪；陕西的李中孚⑫、李子德⑬、王弘撰⑭；广东的屈大均⑮等人，他们彼此影响，互相砥砺，图谋恢复明室，同时，以犀利的笔锋，奔放的热情诗歌酬和，以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著书立说。清康熙元年(1662年)先生在昌平度五十寿辰。秋七月，写就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初稿并书序。同时，还致力于撰写《音学五书》和《日知录》。

康熙四年(1665年)在山东章邱县的大桑家庄购买了房屋，准备暂时定居。不久，又到山西代州，与李子德等二十余人，垦荒于雁门之北，五台之东，以维持生活和调查当地情况。康熙六年(1667年)回南方，在淮安刻《音学五书》。康熙七年(1668年)因黄培诗狱⑯牵连，被关押在济南牢房八个月，经朱彝尊设法营救，得免于难。释放出来后，他的生活十分艰难，仆逃佚散，马瘦变卖，一天两顿饭也吃不上，但艰苦的环境，并没有使这位伟大的学者气馁，他安于清贫生活，勤奋地博采资料，孜孜不倦地探索问题。康熙九年(1670年)夏四月由北京往山东德州，六月在李紫澜家讲《易》三个月。岁末，初刻《日知录》八卷。康熙十年(1671年)

东阁大学士熊赐履（孝感）主持明史馆，知先生对明史的研究，造诣极深，当时要请他参加纂修《明史》，他断然拒之，说“果有此举，不为介之推^⑩之逃，则为屈原之死矣！”他在答他的学生潘来的信中，提及此事说“鄙人事情与他人不同。先妣以三吴奇节蒙恩旌表，一闻国难不食而终，临没丁宁，有无仕异朝之训。辛亥之夏，孝感特简相招，欲我佐之修史，我答以果有此命，非死则逃，……耿耿此心，始终不变，幸此语白之知交”。康熙十一年（1672年）先生六十岁。抚吴江族子衍生为子。冬十月，他往德州由河南至山西与阎若璩^⑪相遇于太原，以所撰《日知录》、《音学五书》相质，阎即为补正五十多条，他虚心从之。阎若璩也十分推崇先生，他在与人书中说“炎武之书精且博。”又说“读顾氏《音学五书》心花怒放，背汗浃出。”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参加《山东通志》的纂修，与此同时，完成了他的巨著《肇域志》的山东部分。十月在德州接到好友归庄去世的讣告，他悲痛万分，于桑家庄设奠遥祭，写了《哭归高士》四首。康熙十四年（1675年）他写信给黄宗羲说自己经历了长期的颠沛流离的亡命生活以后，对于“六经之指，国家治乱之源，生民根本之计”的实际学问，渐有所窥，并盛赞黄宗羲所撰的《明夷待访录》并亲为作序。康熙十六年（1677年）先生已年近古稀，抑且多病，飘泊异乡，生活更加艰苦穷困。当时，他的三个外甥都是清朝的大官，大外甥徐乾学康熙庚戌探花，累官刑部尚书；二外甥徐秉义康熙癸丑探花，官吏部侍郎；三外甥徐元文顺治己亥状元，官户部尚书。人称“昆山三徐”。三人曾多次表示要奉养他，劝他到北京官邸或昆山故里以享晚年，可是先生却之。他在答徐元文的信中说“吾以望七之年，客居斯土，饮餐露，足怡贞性”。以表明他的坚贞节操，不愿依赖他人。

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叶方蔼^⑩、韩炎^⑪欲荐举他应博学鸿儒科，翌年又要招之入史局，先生愤然拒绝，写信给叶方蔼说“七十老翁何所求？正欠一死，若必相逼，以身殉之矣。”自此，他不再至都门。富贵不能移其志，威武不能屈其节，不仅令人肃然起敬，而且对奴颜卑膝的降清官吏是极大的讽刺。康熙二十年（1681年）他经常患病，步履艰难，但认为“有一日未死之身，则有一日未闻之道^⑫”。依然勤奋学习，刻苦著述，从华阴到汾州至曲沃，寻师访友，探求学术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正月初八日先生外出时，上马失足坠地。初九日丑刻溘然长逝于山西之曲沃。卒年七十岁。三月间，从弟岩自昆山至曲沃，偕嗣子衍生扶柩回昆，葬于茜墩祖茔^⑬。

书林绝诣 经世致用

——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《日知录》

先生在经学、文学、史学和地理学方面都有卓越的贡献，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，其遗者有《左传杜解补正》三卷、《九经误字》一卷、《音学五书》三十九卷、《顾氏谱系考》一卷、《石经考》一卷、《历代帝王宅京记》二十卷、《营平二州地名》一卷、《救文格论》一卷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三十四卷、《昌平山水记》二卷、《潏瓠》一卷、《山东考古录》一卷、《京东考古录》一卷、《求古录》一卷、《杂录》一卷、《金石文字记》六卷、《日知录》三十二卷、《菰中随笔》三卷、《经世篇》十二卷、《五经同异》三卷、《亭林文集》六卷、《徐集》一卷、《诗集》五卷、《二十一史年表》十卷、《十九陵图志》六卷、《海道经》一卷、《唐宋韵补异同》一卷、《圣安纪事》一卷、

《万岁山考》一卷、《肇域志》一百卷、《北平古今记》十卷、《建康古今记》十卷、《诗律蒙告》一卷、《下学指南》一卷、《当务书》六卷、《官田始末考》一卷、《岱狱记》八卷、《茀录》十五卷、《熹庙谅阴记》一卷、《营平二州史事》六卷、《惧谋录》四卷等数十种，其中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和《日知录》最为精深宏博，时人给予极高的评价，推为“绝诣”，对后世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是一部博古通今，有关国计民生的著名文献。先生从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开始撰写这部书，到清康熙元年(1662年)写成初稿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论述地方利弊，研究经济发展，极为详细。凡河流水道，田赋徭役，工矿资源，交通运输，各地疆域，关隘要塞以及兵防等情况都以实地考察的资料为依据，提出精辟的见解。例如在水利方面，先生记述了明朝覆亡以后，黄河决口于遭县、睢宁、徐州、原武、建义、孟津、淮安时，室家离散，饿莩载途等惨象，认为兴修水利是根本大计。书中对江南苏州府一带的农田水利，编集了历代治水的主要措施，扼要摘录了宋代郑樵的《水利书》、单锷的《吴中水利书》、元代任仁发的《水利问答》、明代归震川的《三吴水利录》等治水名著，分析研究，综合归纳，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设想：“案水利之说不一，而总其要不过三、四端而矣。其曰复溧阳五堰，常州之望亭堰，务使水不入于太湖者，此杀其上流之说也。其曰开吴淞江、刘家河、白茆、七丫浦，使水或南或北，并入于海，此决其下流之说也。于江河之旁，仿古人之迹，各分为塘浦是又于下流面贯通之也。筑圩岸以围田，作堰遏水，使之毕归于塘浦，而东去之水，自然满盈迅疾，所以为内之势也。置闸以限海水之至，使沙

不入，而水易出，所以为外之防也。是数者尽之矣，而归氏之论尤为卓越，故著之篇终”。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，还叙述了明末国库空虚、苛征暴敛、徭役繁重、赋税不均、剽饷、助饷、练饷等弊政，致民生日艰，冻馁逃亡，流为盗贼。指出江浙为租税最重之区。山西之池盐，四川之井盐，浙江之盐场，征额最巨。对地主豪绅用诡寄、洒派、换算、改册、隐匿、侵占等手段，将国家赋役转嫁给农民的种种积弊一一揭露。书中论述了全国各地的气候特征，并试图解释其形成原因，还提出了划分自然区域的概念。对于边疆的形势和沿革叙述得极为详细。在兵事方面记述了辽东、宣府、大同、榆林、宁夏、甘肃、哈密等地边防的设施及其重要性。

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手稿，自顾亭林先生逝世后，辗转流传，数易其主。辛亥之后，手稿重返故里。解放后，珍藏于江苏省南京图书馆。

手稿的流传和保藏始末，本刊将另文记述。

《日知录》是一部札记性和考据性的史学巨著。这部书，先生以“日知”二字命名，是表明自己的知识来自刻苦学习，长期实地考察，日积月累，诚如他在《日知录》自序中所说：“愚自少读书，有所得辄记之。其有不合，复改定；或古人先我而有者，则遂削之。积三十余年，乃成一编”。《日知录》中贯串着先生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想，同时，也反映出他一生拳拳于《日知录》的写作目的是为了对国家和民族以及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能有所作为。

这部书，在清康熙九年(1670年)初刻于淮安，共八卷。经陆续增补，至康熙十五年(1676年)成三十卷。后来，潘耒在福建建阳刻印的为三十二卷。其中前七卷论经义，八卷到十二卷论政事，十三卷论风俗，十四卷、十五卷论礼制，十

六卷、十七卷论科举，十八卷到二十一卷论艺文，二十二卷到二十四卷杂文名义，二十五卷论古事真妄，二十六卷论史法，二十七卷论注书，二十八卷论杂事，二十九卷论兵和少数民族，三十卷论天象、术数，三十一卷论地理，三十二卷为杂考。

在这部书中，先生在政治、经济方面搜集了大量资料，引证了前人论述，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。他对明末时，土地的高度集中，官府的强取豪夺和田租的过重，表示不满，对农民陷入卖儿鬻女的可悲境况，寄予同情。在《日知录·卷十·苏松二府田赋之重》中收录了唐宋以至明末的官田（包括僧田、学田、驿田等）和民田的租赋以说明百姓苦于田赋之重。“考洪武中，天下夏税秋粮，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……苏州府二百八十万九千余，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……其田租比天下为重，其粮额比天下为多”。“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，为人佃作者十九”。“一亩之收不能至三石，少者不过一石有余，而私租之重者至一石二、三斗，少也八、九斗，佃人竭一岁之力，粪壅工作，一亩之费一缗，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，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”。先生认为重赋是当时阻碍社会发展的主要症结和动乱的根源，主张减轻农民的租税负担。办法之一，“逐县清丈，定其肥瘠、高下为三等，上田科二斗，中田一斗五，下田一斗”。办法之二，均田。卷十《后魏田制》中说“后魏虽起朔汉，据有中原，然其垦田、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”。先生的“减粮”、“均田”的设想，同崇祯二年起义军所提出的“均田免粮”、“公买公卖”似乎相吻合，对佃农也有利，但与起义军的“均田免粮”的纲领和具体内容是不相同的。

《日知录·卷十·纺织之利》提出了巩固边塞，防御边患，